





# 古今之变

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

傅正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今之变: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傅正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675-6869-3

I. ①古… II. ①傅… III. ①文化史—研究—  
四川②巴蜀文化—研究 IV. ①K297.1②K87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6797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六点评论

## 古今之变——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

著者 傅正  
审读编辑 彭海龙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9.5  
字数 145 千字  
版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675-6869-3/K · 493  
定价 58.00 元

出版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关注中国问题  
重铸中国故事

## 缘 起

在思想史上，“犹太人”一直作为一个“问题”横贯在我们的面前，成为人们众多问题的思考线索。在当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突显的是“中国人”也已成为一个“问题”，摆在世界面前，成为众说纷纭的对象。随着中国的崛起强盛，这个问题将日趋突出、尖锐。无论你有什么立场，这是未来几代人必须承受且重负的。究其因，简言之：中国人站起来了！

百年来，中国人“落后挨打”的切肤经验，使我们许多人确信一个“普世神话”：中国“东亚病夫”的身子骨只能从西方的“药铺”抓药，方可自信长大成人。于是，我们在技术进步中选择了“被奴役”，我们在绝对的娱乐化中接受“民主”，我们在大众的唾沫中享受“自由”。今日乃是技术图景之世

## 2 古今之变

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比任何一个时代要多,但我们丢失的东西也不会比任何一个时代少。我们站起来的身子结实了,但我们的头颅依旧无法昂起。

中国有个神话,叫《西游记》。说的是师徒四人,历尽劫波,赴西天“取经”之事。这个神话的“微言大义”:取经不易,一路上,妖魔鬼怪,层出不穷;取真经更难,征途中,真真假假,迷惑不绝。当下之中国实乃在“取经”之途,正所谓“敢问路在何方”?

取“经”自然为了念“经”,念经当然为了修成“正果”。问题是:我们渴望修成的“正果”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经”?从哪里“取经”?取什么“经”?念什么“经”?这自然攸关我们这个国家崛起之旅、我们这个民族复兴之路。

清理、辨析我们的思想食谱,在纷繁的思想光谱中,寻找中国人的“底色”,重铸中国的“故事”,关注中国的“问题”,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也是“六点评论”旨趣所在。

点 点

2011.8.10

序言

## 新今文经学与现代革命志士

刘小枫

从帝制到共和,中国政制的现代转型经历了艰难曲折的百年历程(1840—1949),古老的天安门前竖立起“人民英雄纪念碑”,标志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终于大局初定。如今的我们生活在新生的共和时代,虽然晚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共和经历仍然曲折艰难,毕竟已经进入后共和政治状态。

从英国舰队炮击国门到帝制瓦解,从“真假共和”之争引发内战和外敌趁虚而入到中共军队将外国舰队逐出长江,从共和国在灰烬中重生到改革开放,儒家思想的经历可谓一波三折。今文经学率先突起引领变局,随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成为主流并在“文革”时期贯穿落实,改革开放之后儒家思想又死灰复燃。如今,儒学复兴的学术景观已蔚然可观,不仅论说蜂起,而且内部相互攻讦日盛。就此而言,在后共和时代



的政治状态中检讨儒家思想的百年经历,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不仅具有政治史学意义,而且具有政治哲学意义。

傅正博士的《古今之变: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篇幅虽小,涉及的问题却不小。在笔者看来,本书的实际主题是“新今文经学与现代革命志士”——副标题点明了这一点。“古今之变”这个书名不外乎表明,对儒家而言,“革命”是一个古老语汇而非现代语汇。晚清以来的现代革命堪称独一无二,仅仅因为这场革命的实质乃“古今之变”。因此,新经学与现代革命志士之关系究竟如何,与今天的我们并非没有直接干系。毕竟,无论从制度还是思想层面上讲,这场伟大的“古今之变”尚未尘埃落定。

回顾并检讨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变局的关系,不可能不谈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本书作者则告诉我们:还应该加上,不可能不谈廖平及其弟子蒙文通!倘若如此,我们就得对学界已有的现代儒家思想的历史地图做出重大修正。

### 一、新今文经学的现代革命含义

经学有古文与今文之分,本是汉代重建国家秩序时当为哪些经书立学官之争,因秦火而来的经文抄写文字的差异,成为这场政治冲突的导火索。时过境迁,无论从学术上还是政治上讲,古文与今文之分都早已失去意义。廖平在晚清时局中突然旧事重提,而且提出前所未有的判分标准:古文经与今文经之分不在抄写文字和是否立为学官,而在崇旧制(周礼)

抑或崇新制(孔子所立之制)。作者提醒我们,这个道理甚至“西汉大儒也不知道”(页21)。把这一经学议题转换成政治议题便意味着,今人必须在损益旧制(帝制)抑或创立新制(民主共和)之间做出选择。难怪刘师培、章太炎一类所谓古文派经学家也赞同廖平的判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赞同廖平的新今文学本身,毋宁说,他们欣赏其中所包含的革命正当性法理。

廖平经学的革命品质首先体现在,他并非如人们以为的那样回到汉儒,而是“自创”出一个“新的今古文学说体系”。史学家们迄今仍津津乐道常州学派与晚清新今文学的连带关系,经作者的考察,这其实是个莫须有的史学论题。真实的史学论题毋宁是:既然廖平的今文经学观“恢怪”得出奇且无所依凭,我们就应该问,如此革命性的经学观是怎么来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否得自廖平的启发是现代儒学史上的著名公案,作者却关心另一个问题:身处西南腹地的廖平何以可能会先于身处沿海的康有为发明如此革命性的经学观。

作者首先以“晚清蜀学与经今文学的另一谱系学”为题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并用了三分之一篇幅讲述廖平经学形成的地缘政治背景,以至于思想史研究成了政治史学研究。关于廖平的早年经历,史学家们会津津乐道张之洞慧眼识珠或王闿运打造尊经学院的问学取向等等。在作者看来,这些都是不争的史实,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其实是另一史实:

1874年,英国保守党政府上台,一改克里米亚战争

后期 20 年的对俄绥靖政策,转而在东方全面遏制俄国扩张。从阿富汗到西藏,广袤的中亚大地都成为了英俄争夺势力范围的疆场。……在这种情况下,本来作为内地的川、滇、甘诸省突然成为了边疆,成为了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交锋的前线。(页 31—33)

现代列强进逼中国不仅有海路(从沿海到内地),还有陆路(从中亚、南亚经新疆、西藏到内地)。经作者这么一提醒,笔者才恍然明白,身处内陆腹地的廖平为何会具有全球政治地理视野。1898 年,廖平刊印其“三变”期的代表作《地球新义》,提出孔子已知全球为九大州、中国为小九州的著名论断(页 61—66)。凭靠重新解释中国古代经典来建构一套儒家式的全球政治地理观,是廖平经学中的一大亮点。廖平一生学术多变,这一点并未改变。

作者没有举例让我们领略廖平儒家式的世界政治地理说高论,笔者不妨引廖平在《地球新义》刊行 20 年后(1919)发表的一篇论述《诗经·国风》“五帝分运”的文章中的说法,以便读者切实感受一下廖平经学如何“恢怪”得出奇。廖平文章说,他仍然坚持自己曾凭靠《周礼》中的“赋、比、兴之名”推衍全球政治地理的“九国而三统之说”:

《王风》,《鲁诗》以为鲁,在东大统,以托伏羲,为海外东经、大荒东经。以中国为中,则日本以外之海岛,当为今美洲。《豳》在雍,乾位西北,为少昊所司之分,为海

外西经、大荒西经,为金德王之政。欧以中国为中,则应以欧洲当之。盖就中国言,以美为东,以欧为西。就中土言,则以中国为东,美为西。《诗》之“中”字有二义,一指中国,一指中土言之。……孔子殷人,先就三统立说。且美洲非圣人旧,虽曰金统,要必由中以化外,故国少昊曲阜,以西方之中亦归于东鲁。如少昊以金德为帝,治五洲,其余四洲之帝皆退位。以神主之,东洲则勾萌,本洲则祝融,中洲则后土,北洲则玄冥。以金德王,当在美洲立留都。<sup>①</sup>

即便在当时的中国知识人看来,这样的说法也明显穿凿附会得可笑,遑论今天的我们。尽管如此,作者的政治史学笔法提醒我们应该意识到,地理大发现始于16世纪,西欧人直到18世纪才大致形成明确的全球地表知识。<sup>②</sup> 德国大学在1874年建立地理系,标志着科学的世界地理观开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争夺全球支配势力范围的工具,麦金德在1904年提出的地缘政治观堪称最好的例证。廖平在1898年提出儒家式的全球政治地理观,缺乏的仅是地理学的实证知识,相比之下,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虽然有实证知识垫底却缺乏德性。

因此,廖平的“地球新义”的问题并不在于他把刚刚得知

<sup>①</sup> 廖平,《诗说》,潘林校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72—73。

<sup>②</sup> 比较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1972),李旭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页166—180。

的地理大发现知识塞进了中国古代经典,而在于他凭此将孔子推为世界教主。

《诗》之主教,则在东方。以孔居鲁,少昊之都亦在鲁,故曰“颠倒衣裳”。金德之帝,不在西洲,而在东洲。考三统九风,一统一君二臣,如《易》之三人行损一人,一人行得友二臣,以备二统之臣,君则自王之主国。如《邶》为王,则鲁、周二统之《王》、《豳》退位,以《郑》、《魏》为之臣。如一王而二伯,《王》为王,则《邶》、《秦》为之臣。亦如《易》之三爻中,有一君二臣也。而一篇之中,又自分三统,有自应本风之篇,有附应二统之篇。可以考见,由斯以推,则一风分应三统,九风互相为君臣佐佑焉。(廖平,《诗说》,前揭,页73)

可以看到,《王制》是廖平推衍全球政治地理的“九国而三统之说”的基础。作者恰切地指出,廖平“完全以《王制》为绳准,只有符合《王制》的才配成为‘今文经’”——用廖平自己的说法:“至于今学,则全祖孔子改制之意,只有一派”(页49)。由此我们得知,即便廖平的新今文经学谱系是伪造,也算得上哲人式的立法行为,用实证史学的脑筋来衡量,当然扞格难通——问题在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法国著名思想史家哈扎德(Paul Hazard, 1878—1944)在其名著《欧洲意识的危机》一书序言中曾说,伏尔泰的《论普遍历史》几乎在一夜之间取代了波舒哀的《论普遍历史》:“大

多数法国人一直像波舒哀那样思考,突然之间,法国人像伏尔泰那样思考:这是一场革命”。<sup>①</sup> 廖平把孔子推为世界教主,与其说必然与泰西的基督教迎面相撞,不如说与现代的文明进步史观狭路相逢。因此,作者在“孔子的‘一神化’与文明进化史观”这一标题下讨论廖平的地理观,恰如其分。如今的我们很清楚,无论基督教还是儒家的世界观都面临地理大发现以来形成的文明进化史观的致命挑战。

廖平区分“小九州”与“大九州”,“真三代”与“王之三代”,其根本时代背景是古人对于上古三代的信仰破产了,对上古三代的研究不再具有致用的价值。如此一来,经学就面临覆亡的危险。(页 66)

廖平的新今文经学显得是绝地挽救儒学的行动,但在作者看来,这似乎无异于儒家传统的自杀。首先,由于“体现孔子‘因革继周’之道的今文经少之又少,反映旧史的大多数经文又‘各就所见立说’”,廖平提出的今古文经学的区分标准就“撕裂了”体现古三代典章制度的六经的整体性,为后来经学的实证史学化大开方便之门。作者敏锐地推断,民国古史辨派将六经还原为史料,实起自清末今文家(页 51,比较页 83)。

第二,把儒学打造为一神教,在中国“恰恰推动了历史进

---

<sup>①</sup> Paul Hazard, *La Crise de la Conscience Européenne: 1680—1715*, Paris, 1935/2005, 页 4。

步观念的形成”。作者在上篇结束前添加了长篇“附论”，提出中国的现代历史主义实际有“两条路径”。言下之意，本来是要抵制历史主义的新今文学反倒开辟出了一条独特的历史主义路径。

笔者感到困惑：按作者的辨识，廖平恰好要通过其确立的新今文经学标准阻断对经学的史学理解，何以可能引导出一种历史主义？作者没有深究这个问题，他的关注几乎完全被自己所发现的廖平经学的革命性质吸引。在结束对廖平经学的考察时，作者说，虽然廖平与康有为都以尊孔唯尚，但廖平经学更具革命品质：康有为凭靠新经学提倡改制，廖平凭靠新经学提倡革命，从而其经学主张更为激进。作者强调，这并非他自己的看法，而是廖平弟子蒙文通的观点：“康有为虽然剿袭了廖平的观点，却从未剿袭到廖平学术的真精神，这个精神就是革命”（页67）。显然，作者更为关切这样一个政治史学问题：蒙文通的经学观可能比廖平更具有革命品质。

情形若真的像作者让我们看到的那样，后共和政治状态中的新儒家们就得小心了：他们自以为在弘扬儒家传统，没准儿恰恰是在破碎儒家传统。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只要是弘扬儒家就没问题，毋宁说，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弘扬以及弘扬儒家传统中的什么。

## 二、新经学与新知识人

结束对廖平新今文经学之革命性质的剖析后，作者戏剧

突转式地谈起了一个看似与廖平的经学革命并不相干的论题：“本省意识、保路运动与蜀学认同”。由于这一部分的标题是“中等社会的革命”，笔者不禁好奇：廖平及其弟子蒙文通的新今文经学与“中等社会的革命”有什么关系吗？

为了更好地理解作者的论述，有必要简扼回顾保路运动的来龙去脉。这一运动历时数年，其高潮“成都血案”史称辛亥革命前奏。事情原委大致是这样：1903年9月，清廷推行“新政”搞改革开放，允许民间集资办铁路、矿务、工艺、农务等公司，各省陆续成立私营铁路公司集资修铁路。清廷没有想到，如此“新政”举措会损害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进而引发民间私营公司与西方列强所谓在华铁路修筑权的利益冲突。换言之，清廷高层对现代政治缺乏基本常识，竟然不知国家主权为何物。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绅商首先发起“收回路权”运动，并在1905年成功从美国人手中赎回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修筑权。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是，愚蠢的清廷在1911年春东施效颦成立“责任内阁”后不久（同年5月），随即颁发“上谕”宣布商办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并派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强行接收湘鄂川粤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打算把筑路权卖给英美德法四国财团。

湖南人首先起身反抗，在绅商组织下，长沙和株洲出现万人筑路工游行示威，甚至包围了巡抚衙门。湖北人随后跟进，绅商组织筑路工与前来强行接收的政府军发生冲突，当场打死政府军20余人。成都的保路运动出现得稍晚却更持久，组织性也更强，保路同志会成立10天就发展到十万之众。愚蠢



的清廷仍然采取高压手段,没想到同盟会早已介入,与地方哥老会联手,把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准备武装反抗。四川总督赵尔丰设计诱捕省谘议局议长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要人,引发数万人包围总督府,赵尔丰竟然下令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几天之内,成都附近州县保路同志军二十多万人围攻成都。由于行动仓促又缺乏统一指挥,同志军攻打成都十余天未果,不然的话,辛亥革命的发生地就不是武昌了。尽管如此,新共和国开国元帅中,川人占四位,湖南湖北各占两位,绝非偶然。

显然,在作者看来,保路运动是所谓“中等社会的革命”。作者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清廷已经搞改革开放而且准备立宪,何以成了自掘坟墓。这明显属于政治史学论题,作者的论析甚至带有历史社会学史学的痕迹:通过考察保路运动与本省意识和蜀学认同的关系,作者希望解释“静悄悄的革命”何以最终引致“孙中山和暴力革命话语的成功”(页95)。

作者让我们看到,所谓“中等社会”这个概念的具体所指有不同的界定,但无论哪种界定都会包含新知识阶层。作者还提醒我们:

“中等社会”的优势在于,它作为当时人自己的术语,既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又是分析历史的框架。(页102—103)

这当然不等于提醒我们,20世纪末东欧的“公民社会”或